

对中国历代大规模治水活动的思考和启示

刘千程

21世纪是中国治水思路发生重大转变的历史时期。从20世纪末以来,水利工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人口增加、气候变暖、洪涝干旱频发、水污染和水土流失问题严峻的形势,实施了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的重大转变,卓有成效地进行了治水新思路的探索和实践。在这转折时期,回顾历代大规模的治水活动,汲取历代治水的经验教训,传承弘扬水文化的优良传统,对我们树立科学的治水理念,深入理解和贯彻落实治水新思路,研究解决当前水利发展改革面临的问题会有许多帮助和启迪。笔者就谈谈对这个问题思考后的体会和启示。

一、中国历代大规模治水活动的重要地位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有史记载的中华民族史,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与洪涝、干旱灾害不懈斗争并不断前进的历史。数千年来,在以农业立国的农耕经济时代,治水对当时经济社会的发展始终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历代大规模的治水活动不仅直接参与了中华物质文明的创造,而且极大地丰富了中华精神文明的宝库,为我们留下了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1. 自然条件决定了水旱灾害的多发性

我国地处欧亚大陆东部,濒临浩瀚的太平洋。降雨特别是暴雨受东南季风影响,多集中在夏季,雨带的移动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脊线位置变动密切相关。一般年份,从4月开始,到8月中旬,随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脊线由南向北推移,降雨带逐次从岭南珠江流域及沿海地区向长江和淮河流域、黄河流域、海滦河流域和东北地区移动。7月、8月,华南和沿海地带热带风暴和台风相继登陆,南方出现第二次降雨高峰。8月下旬,副高脊线开始南撤,华北、华中雨季相继结束。如果副热带高压脊线在某一位置迟到、早退或停滞不前,就将在某一些地方发生持续干旱和在另一些地方发生连续大暴雨。

这些大暴雨多发生在山地、丘陵向平原过渡的地带,是江河洪水的主要来源。据有关实测资料,内蒙古上地最大降雨达401毫米/小时,河南林庄最大降雨达830毫米/6小时,台湾阿里山最大降雨达1748毫米/6小时,暴雨强度十分惊人,接近世界纪录。大暴雨历时长、覆盖面广。如黄河流域一次大暴雨一般历时2~7天,面积可达3~7万平方公里,总降水量可达100亿~550亿立方米。长江流域一次大暴雨一般历时5~9天,面积可达10万~20万平方公里,总降水量可达300亿~700亿立方米。大洪水年或特大洪水年,一个流域往往发生数次连续性大暴雨,形成巨大的洪峰流量和洪水总量。如:1933年黄河大水,受灾面积达1200平方公里,364万人无家可归,1.8万人被夺去生命。长江1931年大水,5000多万亩农田被淹,近2900万人流离失所,14万人被洪水夺去生命。

特定的气候条件决定了洪水灾害历来是威胁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心腹之患。

同样的道理,气候条件也决定了干旱灾害在这块土地上频频发生。如黄河流域,从公元前1766年至1944年,有史记载的旱灾高达1070次。严重的旱灾造成粮食颗粒无收,赤地千里,饥民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如1876~1879年,晋、冀、鲁、豫连续大旱,饿病而死者高达1300多万人。这无疑给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2. 大规模治水是民族生存发展的命脉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西部崇山峻岭,东部濒海平原。江河水系顺地势自西向东流入大海。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岩土受自然侵蚀后形成的江河泥沙,逐渐填平中下游的许多湖泊洼地和海湾,形成了广大的冲积平原和三角洲。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松辽平原和各大江河河口三角洲地形平坦、土壤肥沃、水源丰富、雨热同期,适合发展农业生产,是有史以来我国农耕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中华民族的绝大部分就是在这些冲积平原上,从原始部落逐步走向现代文明。

在江河泛滥携带泥沙淤积的冲积平原上,古代先民发展农业生产,首要条件就是必须与洪水抗争,在江河两岸修筑堤防,开发土地,扩大农业生产,以适应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的需要;疏通宣泄洪水的河道,给洪水以出路,以提高堤防的防洪能力,降低抵御洪水带来的风险;同时开发利用河水,修筑渠道引水灌溉和排涝,做到旱涝保收,提高粮食的产量。这表明那时先民已摆脱了对自然环境的单纯依赖,开始与洪水争夺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努力为自身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和提供最基本的水资源保障。这里需要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历史上曾长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黄河又是一条以河水含沙量高而闻名于世的河流。据不完全统计,从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中,可考证的黄河下游洪水泛滥的年份有543年,决口1590次,经历了26次改道,洪灾波及范围曾北达天津,南抵江淮,面积达25万平方公里。这对于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来讲,以治理黄河为重点的大规模治水活动就成为民族求生存、谋稳定、图发展、安邦定国的头等大事和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命脉。

二、中国历代大规模治水活动取得的成就

纵观中国有史以来的治水活动,大体经过三个发展阶段。一是“缘水而居,不耕不稼”。在远古时代,先民“逐水草而居”,依靠采摘果实、打猎或放牧牲畜,获取赖以生存的资料。那时,先民面对滔滔洪水和赤地千里的旱灾,无能为力,只能逃避。二是防水患、兴水利。随着人口增加,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与水争地为利,不仅不断加高加固堤防、疏浚河流,而且大规模地围河、围湖、围海造田,筑坝建库、修渠道、开运河、建电厂,发挥防洪、灌溉、供水、通航、发电等综合效益,进入了按照人类的意愿改造自然的阶段。三是科学治理开发,实现可持续发展。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由于人们大规模地向水逼近,无休止地向水索取,结果造成大量湖泊面积缩小和河流行洪能力不足,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人类在反思治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识到人类一方面要为改善生存条件与不利自然环境作斗争;另一方面也要遵循自然规律主动限制对水开发利用强度,“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目前,我国水利工作正进行着这一历史性的重大转变。回顾数千年来我国治水活动取得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明显的

特点。

1. 顺应水势，筑堤疏导

相传上古尧舜时代，整个世界处于“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尚书·尧典》）的境地。中华民族的祖先与洪水进行了英勇的抗争。起初，帝尧命鲧治水，鲧用“壅防百川”的办法，“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被杀于治水任上。后来禹接任治水重任，吸取了鲧治水失败的教训，改用疏导为主的方法，“禹疏九河，濬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孟子·滕文公下》），经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战胜了经年不息的洪水，使人民“降丘宅土”，得以在平原生活，陂障湖泽，开辟沟洫，发展农业，“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尚书·禹贡》）。几千年来，人们一直都把防洪作为治水的首要任务，在当时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允许的条件下，大规模地进行江河堤防和海塘建设。据有关统计，到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已建成各类堤防约有4万公里。

在我国各大江河的治理史中，以黄河的治理最为紧要 and 典型。其中，汉永平十二年，王景受命征民工数十万治理黄河，相度地势，开凿山阜，建立水门，自荥阳至千乘口筑千里大堤，使黄河水与汴水分流，在两堤约束下，流入大海，消除了频繁的水患，实现了尔后黄河800年的相对安澜。在我国治黄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2. 修筑渠道，灌溉排涝

早在大禹治水时，当他把洪水疏导入海后，就把主要精力转为“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表明那时，先民已认识到水往低处流的规律，运用于平治水土的实践，开始了以构建灌溉和排洪系统为主要内容的农田水利建设。在漫长的农耕经济时代，人们治水的目的除了防御洪水，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外，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开发利用水，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为人类生产生活服务，以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据有关统计，经过历朝历代的不懈努力，到1949年前，全国有效灌溉面积已经达到1600万公顷。

纵观我国历史上的灌溉工程，都江堰和郑国渠最有代表性。都江堰始建于秦昭襄王末年（公元前256年～公元前251年），由秦蜀郡守李冰主持兴建。据《史记·河渠书》记载李冰“穿二江成都之中”，将水旱灾害不断的成都平原变成沃野千里，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成为秦国重要的粮食供应基地。郑国渠于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动工兴建。《史记·河渠书》记叙如下：“凿泾水中山西的郿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灌田……渠就，用填闕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成都平原和关中平原灌溉系统的建设，大大增强了秦国的经济实力，为秦国扫平六国，完成统一海内的大业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3. 开凿运河，沟通水系

在陆上交通不发达的古代，人工开凿运河，用船进行水运是当时最便捷、最经济的方式。据史书有明确记载的人工运河，开凿于鲁哀公九年（公元前486年），是吴王夫差沟通江淮的邗沟，其后四年，又沟通泗水及济水的菏水，实现了黄河和淮河间的通航。魏惠文王开鸿沟，在黄淮之间又开一水道。秦代开灵渠沟通长江、珠江水系。东汉末年，曹操在黄、海、滦水系间开凿了一系列运河，初步形成了北至滦河、南至珠江的水运通道。隋炀帝在先人开凿运河的基础上，进一步贯通了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

水系的南北大运河，至此大体构成了我国的内河运输网络。随后，唐、宋、元、明、清各代为了确保漕运畅通，主要对南北大运河进行了疏浚和改扩建，使大运河成为纵贯南北的交通大动脉。以大运河为纽带的内河运输网络沟通了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维护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对形成共同的民族认同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清咸丰五年黄河改道后，因海运和铁路兴起，大运河日趋衰败，民国时仅局部通航。

4. 统筹兼顾，全面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我国水利建设进入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速度最快、效果最显著的全面繁荣期。据有关资料统计，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国已建成堤防 28.1 万公里，建成水库 8.7 万座，水库总库容达到 5929.8 亿立方米，主要江河基本形成了以堤防、水库、蓄滞洪区等组成的工程防洪体系，有效地提高了对洪水的防御能力；有效灌溉面积增加到 5500 万公顷，机电排灌总动力发展到 7000 多万千瓦，全国除涝面积累计达 2093 万公顷，盐碱地改良面积 587 万公顷，1/3 的渍害低产田得到治理，大大提高了农业抗御水旱灾害的能力；兴建了大量的蓄水、引水、提水工程，年供水能力达 5716 亿立方米，形成比较完善的供水保障体系，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全国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97.5 万平方公里，有效保护了国土资源，改善了生态环境；农村水电装机容量增加到 5000 万千瓦，约占全国水电装机总量的 37%，年发电量达到 1500 多亿千瓦·时。越来越彰显出水利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

三、中国历代大规模治水活动产生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文明古国。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业对水的依赖直接导致了历朝历代都进行治水活动。马克思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大规模的治水实践不仅使先民加深了对治水规律的认识，而且反映折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和重大的影响。

1. 不断摸索和逐步深化了对治水规律的认识

水是生命之源，人类的生存发展离不开水。作为自然界的水是自在之物，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历代先民在兴水利、除水害的长期实践中，不断摸索和总结治水的经验和教训，逐步加深了对治水规律的认识，形成了顺应自然规律，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愿望，利用水往低处流的自然属性，因势利导，综合运用疏导、筑堤、调蓄和开发利用等方法，实现人与自然（水）和谐相处的治水理念。成为几千年来指导人们科学治水的强大思想武器。

历史上，大禹培植山丘，流通河流，筑堤防，围湖泊，培育湿地，开发平原，在冲要的地方建立城镇，“会通四海”。战国末年，都江堰、郑国渠和江淮地区“长藤结瓜”式的灌溉工程的成功建设。西汉贾让对治理黄河提出不与水争地，给洪水以出路的“治河三策”，昭示后人不能一味强调人定胜天，用加高堤坝来约束洪水。明代潘季驯对治理黄河提出束水攻沙和放淤固滩方略，纠正只重治水，不重治沙的倾向等等。这些无不闪烁着科学治水理念的光辉，成为历代治水的成功典范，至今仍对我们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2. 有力促成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马克思曾对治水与古代东方社会政治的关系，讲过一段十分精辟的话。他说：“在东

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有不能不执行的一种公共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流经我国的大江大河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流域系统，面对滔滔而来的洪水，必须将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治理，需要统一的意志和行动，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机构，组织和协调人力、物力用于治水斗争。大禹治水时，“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杀而戮之”（《国语·鲁语下》），“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山海经·海内经》），表明大规模的治水活动使大禹取得了凌驾于氏族制度之上的强权，催生了君主王权的产生，为世袭专制制度取代禅让制提供了重要条件。进入封建社会后，历代大规模的治水活动，都是由中央政府举国之力来组织实施。如：汉武帝“沉白马玉璧于河”，亲率文武百官赴瓠子决口处参加黄河堵口。北宋初年，鉴于黄河河堤连年溃决，建立了河堤岁修制度，“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毕”（《宋史·河渠志》）。据宋人王得臣记载，绍圣年间，朝廷所支岁修钱“以缗计，月率四十余万”，约占宫廷全部月支钱的1/4。宗元丰元年（1078年），动员70万军民堵塞黄河决口。清康熙皇帝把“河务”、“漕运”、“撤藩”作为三件最紧迫的大事等等。可见当时治水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何等重要的地位。这些历史事实充分表明：大规模的治水活动对中华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十分重大的影响，它不仅催生了中央集权国家机构的产生，而且是国家机构履行职能，安邦定国的头等大事。

3. 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和重要保障

中国古代治水构筑了大量的工程设施。主要有：一是构筑防洪工程，使人民得以在江河流经的丰饶土地上进行农业生产和生活，免除了遭受洪水的威胁。二是兴建灌溉和排水系统，提高了农业抵御水旱灾害的能力。如战国时，魏国邺令西门豹开引漳十二渠，使漳河两岸粮食亩产提高了3倍，产量达到亩产近千斤。汉武帝时，“用事者争言水利”，优先发展关中农田灌溉事业，使关中在当时“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其富，什居其六”，有力促进和保障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三是开凿运河，沟通天然水道，形成纵贯南北的水上交通大动脉，加强了各地之间的联系和交往，维护了社会政治稳定，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四是构筑城市防洪、供水、排水系统，美化了城市环境。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口地说，大规模的治水活动为古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起到了发挥基础设施和重要保障的巨大作用。

4. 孕育丰富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思想文化宝库

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社会在漫长的农耕经济时代所创造的中华文明，从本质上讲是农耕文明。中国特殊的气候和自然条件决定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因此，古代大规模治水活动就成为孕育中华文明的摇篮，极大地丰富了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宝库。

《周易》居中国古文化典籍之首，素被称为“群经之首”、“六经之原”。据《周易·系辞传》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传说大禹治水时，有龙马从黄河出，背负“河图”，言治水事，有神龟从洛水出，背负“洛书”，言治国大法。《周易》认为“河图洛书”是天降“神物”、“圣人”法则，是远古华夏庄严崇高的法典、祥瑞神秘的圣经。后来，正

是依据“河图洛书”演化为八卦，才撰写成《周易》一书。由此把“河图洛书”作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如果我们剔除其中的神话色彩，用现在的观点看，可以说“河图洛书”反映了远古先民对客观世界高度概括抽象后，对世界普遍性规律的理性认识，是指导先民治水治国的理论依据和最高准则。从这里我们就不难看出治水活动在历史上对中华文明的孕育和产生曾发生过多么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孔子和老子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两个集大成者。孔子开创的儒家文化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国民性格。老子是道家学说的创始人，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在他们的著述中有许多关于对水观察、思考、体验和认识的名句。如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老子讲：“上善若水”等。更重要的是大规模治水的实践活动和经验教训，为他们博大精深思想体系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儒家学术的核心是“三纲五常”，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与大规模治水活动强调集中统一领导，强调树立大局观念和严格组织纪律，强调局部服从全局、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的要求在理念上是一致的。道家学说的最高境界是“道法自然”。这又与强调遵循自然规律，因势利导的治水思想在哲学意义上是一脉相承的。由此可见，儒家和道家学说思想与治水实践活动紧密的渊源关系。

在与频繁水旱灾害的长期斗争中，中华民族锤炼铸就了崇高的治水精神。历史上无数的治水英雄中，大禹最具代表性。他“抑洪水十三年，三过家不入门”（《史记·河渠书》），“身执耒耜，以为民先”，充分表现了以天下为己任、为民造福的无私奉献精神。他“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甚风”（《庄子·天下》），发扬了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艰苦奋斗精神。他“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坚决贯彻了顾全大局、同心协力的团结治水精神。他“左准绳，右规矩”、“因水以为师”，积极践行了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科学精神。这些精神集中起来就形成了崇高的治水精神，成为激励后人与自然灾害顽强搏斗的强大精神动力，并作为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宝库。

四、联系当前水利工作思考的几点启示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中国几千年的治水实践，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成功经验。重温古代遵循自然规律，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治水理念，认识古代治水活动产生的巨大影响，弘扬崇高的治水精神，对我们深入认识水利工作的重大意义，实施治水思路的转变，解决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实现水利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如果我们把历史、现在与未来发展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1. 必须认清水利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的水利工作面临着与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同的严峻形势。一是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人口的增加，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重要因素。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本来就低，只有 2185 立方米，不到世界平均量的 30%。时空分布又很不均匀，整个北方仅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 19.1%。特别是近 20 年来，黄淮海江地区水资源总量又下降了 10.8%。目前全国严重缺水的城市已达到 110 座。二是极端天气造成的重大灾害的危险性正在增强。随着全球天气变暖趋势加快，近几年我国气候异常，极端天气频繁，洪涝、干旱、台风和山洪多发并发，其波及范围之广，造成危害之

大，都是历史上少见的。这使得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问题更加突出，暴雨洪涝灾害和持续干旱更加严重，凸显了对应突发灾害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三是水污染的势头仍未得到有效遏制，水环境建设任重道远。从我国进入工业化进程以来，由于起点低，经营开发粗放，大量废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导致一些地区水环境严重恶化。一些地区水资源开发过度，引发严重生态问题，出现河道断流、湖泊干涸、地下水水位下降等现象。1/3以上国土面积存在水土流失问题。这些都是过去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问题。因此，我们面临着比历代前辈更加严峻复杂的形势，肩负着比历代前辈更加光荣艰巨的任务。历史发展到今天，水利理应得到比过去任何时期更加高度的重视和支持，我们也理应干出比历代前辈更加辉煌的业绩。

2. 必须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水利工作全局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推动水利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方针。古代先民在长期的治水实践中，已认识到要顺应自然规律，因势利导，形成了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的治水理念。今天，我们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坚持以人为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破解水问题的核心理念，遵循客观规律，统筹兼顾，实现水利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要注重给洪水出路，改变长期以来人水争地，无节制围垦河道、湖泊、湿地的做法；要注重水资源的节约和保护，强化需水管理，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注重水资源开发、配置、调度中的生态问题，使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承载能力和水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要注重发挥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有效治理水土流失。我们必须不断丰富完善水利可持续发展新思路，才能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水资源支撑和保障。

3. 必须加快水务管理一体化建设的步伐

自然界的水由天上水、地表水和地下水共同组成。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转换，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循环系统。古代，由于生产力低下，人类社会对水资源的需求有限，管水机构的设置很简单，管理人员也很少。在进入现代社会实现工业化后，因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涉水事务也越来越繁杂，管理机构和人员也逐渐多了起来。我国改革开放前，因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有的地方涉水事务管理的部门曾多达5个以上，被人们形象地喻为“多龙管水”。人为地造成了部门之间职能交叉重叠，增加了部门之间工作协调的难度，影响了涉水事务统筹规划和高效有序进行。改革开放后，不少地方本着归口、精简、效能的原则，把涉水事务统一归口水务局，实施集中管理。这样做理顺了机构，减少了扯皮，精简了人员，提高了效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因此，我们要抓住深化国家机构改革的有利时机，遵循自然界水运动的客观规律，把水作为一个整体，运用系统论的观点整合涉水管理的机构和职能，争取尽快在全国实现水务管理一体化，以切实提高管理工作的效能和水平。

4. 必须加强流域机构的职能和管理力度

各大流域机构是国家水行政主管部门派出的办事机构，代表国家水利部担负各大流域的水行政管理职能。主要负责流域内的水行政执法、水资源管理、流域规划、防汛抗旱等项业务工作。自然界的流域是因地形条件限制而形成的天然区域，流域流经的范围与行政

区管辖的范围很不一致。我国七大江河流域一般都流经数省，甚至十几省（包括省的部分地区）。地方政府是行政区内经济社会发展的责任主体，对辖区的水利建设起主导作用。每当制订流域发展规划时，确定各大功能区划时，合理控制和调整流域水资源开发力度时，跨流域或跨行政区配置和调动水资源时，各大流域机构与一些地方政府之间，一些地方政府相互之间常常因发展目标不同出现意见分歧和利益之争，目前各大流域机构对这些问题协调起来难度很大。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维持河流的健康生命，实现流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从流域全局的高度考虑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因此，各大流域机构必须加强管理职能，优化事权结构，使其有足够的权威和能力担当起河流代言人的责任，妥善协调处理流域与地方政府之间和各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切实履行好各大流域水行政管理的职能。

5. 必须重视传承弘扬水文化的优良传统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治水实践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精神文明成果。水文化作为反映治水实践活动的社会意识，集中体现了有史以来无数治水英雄不畏艰险，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创造力和优秀品质，成为启示、影响和塑造人们的精神生活，推进水利事业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在抗御 1998 年长江特大洪水斗争中，“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广大水利干部职工积极践行的“献身、负责、求实”水利行业精神，都是民族治水精神的传承和弘扬，是水文化优秀传统反作用于治水实践的生动体现。在党的十七大提出大力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新形势下，我们要把水文化作为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挖掘水文化的优良传统，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扬。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在波澜壮阔的治水实践中不断推陈出新，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水文化。要充分发挥水文化的凝聚功能、引导功能、教育功能和激励功能，用水文化的力量团结、教育、鼓舞广大干部职工投身于可持续发展水利建功立业，努力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把我们的国家建设一个世界经济和文化强国作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单位：水利部直属机关党委
职 务：调研员
职 称：高级政工师